

◀ (上接3版)

第三,也是全球史书写的一个通病,就是基本上不用、也很难使用一手资料。按照经验式的历史学要求,不管写什么历史,需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可是这本书以及其他全球史的书,资料是有的,但基本不用一手资料。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懂不了那么多语言,非洲的斯瓦西里语、加纳的土著语言,或者是马来语、印尼语、中国广东方言、苏格兰方言、爱尔兰方言,不可能什么都懂。没有这些语言基础,想要写一个全世界的东西,就没办法用那些最基本、最原始、被称为一手资料的东西。从这个方面说,全球史的写作其实是有很大的缺陷的,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第一,语言的局限性;第二,对种种不同缺少理解,而这个世界又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因此,全球史的写作也受到了一部分历史学家的批评,这是全球史这个学科自身的、内在的缺陷,非常难以克服。

第四,也是难以克服的缺陷,就是空间填满了,但实体看

不见了。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全球史书写所有缺陷中最严重的一个。全球史试图去填补纵向存在之间的空白,花了很大的力气,可是在填充空白的同时,就像我刚才打的比方,他们把那些宇宙实体忘记了。换句话说,几乎在所有的全球史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个实体间的那些空白都充实了,但我们却看不出那些实体发生了什么。打个比方,你们现在网购一箱苹果,商家把一箱商品送来的时候,你看到每个苹果之间填上了塑料或其他填充物,免得在路上碰碎了。全球史出现的偏差,就是它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填充物上,而那些具体的实体却没写。也许是忘了,也许他认为这些实体的东西你们都知道,我不用写了。但是,这样的写作方式,就给读者留下遗憾,我们读完之后会追问,那些实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

全球史究竟是什么

先讲一个小故事。大概是2007、2008年,我到德国参加

一个活动,休息期间历史学家在一起聊天,互相询问研究领域是什么。第一个人说是全球史,第二个人也说是全球史,第三、第四、第五个人都说是全球史,最后有一个人出来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做全球史。

这是真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做全球史呢?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全球史究竟是什么?每个人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其实就是在历史学家范围内,对全球史的解释也是不同的,包括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本特利(Jerry H. Bentley,1949—2012)他们关于全球史的解释也是有差异的。全球史出现后变得非常时髦,成了全球招牌。但对于什么是全球史,我相信大概不会有标准和准确的理解。

2000年,我在挪威参加国际史学家第19次大会,那届大会的主题就是全球史。会议结束后,我很快写了篇文章,介绍了大会的基本内容,这篇文章应该是国内第一次把西方人关于全球史的一些想法进行了系统整理。在此之前,国内已经出现了全球史这个

概念,但是没有人对全球史究竟是什么、西方人如何理解全球史做过系统梳理。从那次大会的内容来看,至少在那个时代,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全球史家们对于全球史的理解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关系。全球史是做什么的?是做相互关系的。

第二,互动。我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在你那里产生了什么结果,反过来又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第三,对比。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是怎样的,法国工业革命是怎样的,再与德国、中国、日本的工业革命进行对比。

第四,传播。比如物种传播、细菌传播、火药传播、印刷术传播等。

那个会上大家关于全球史的理解,就是这四方面。我想,如果按照这四方面去理解,那全球史就太多了,全球史就不是从麦克尼尔开始的,而是早就有了。比如对比,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工业革命、日本工业革命的对比研究早就有人做了。比如传播,基督教传播史、西学东渐等也早就有人做了。当全球史作为一个口号或者观

念,突然之间为人所知,而且被世界历史学界当作一面旗帜拿出来,问题还是回到了——全球史究竟是什么?

如果按照刚才说的四方面去讨论的话,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循环。我刚才发言中提到的一些全球史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其实很快被人们意识到了,而后来人试图去纠正、克服它。但在纠正、克服的过程中,人们其实是在向传统史学回归,尽管没有完全回归到传统史学中,但也在向这个方向跨了一步。1929年诞生的法国年鉴学派,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特点,到了第二代淡化了,到第三代不见了,最后出现了《蒙塔尤》(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这和第一代年鉴学派的作品放在一起比,天壤之别。在我看来《蒙塔尤》不是年鉴学派的作品,是传统的东西,可是它的作者是第四代年鉴学派的掌门人。我说的意思是,全球史可能在走同样的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5月21日在北京大学讲座部分内容整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中国抗战

王健

今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2015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方主战场,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春,罗斯福就对其子说,假如没有中国牵制日本的兵力,日军可以毫不费力地一直冲向中东,并和德国配合起来,形成大规模夹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说过,“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但是,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有意遮蔽了中国的牺牲、作用和贡献。因此,挖掘和宣传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对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挖掘和宣传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互相帮助的历史故事,不仅可以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通过这些患难与共的真切感受来生动地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和内涵。在中国抗战期间,就以上海而言,中外友好,互相援助,共同抗敌的故事就不胜枚举。例如,上海人民在战时救助了至

少2.5万欧洲犹太难民,数量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同时期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被世人称为“上海方舟”。与此同时,犹太难民和在华犹太人也采取各种措施支持中国抗日。上海犹太难民医生罗生特和傅莱分别参加了新四军和八路军,投身抗战前线。犹太记者汉斯·希伯积极报道中国,特别是中共领导下人民军队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最后不幸牺牲,血洒中华大地。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被称为“难民之父”、“中国之友”。其创立的战时平民保护模式于1949年8月被列入《日内瓦第四公约》。又如,1932年4月韩国义士尹奉吉化名混入虹口公园,用炸弹炸毙“一二八”战役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重伤一批在沪的日本军政要员。当时中国军民正处于战役失败的阴影中,这一事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也在心理上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而上海作为韩国临时政府长期所在地,也给予韩国独立运动以巨大的支

持。再如,作为近代上海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西文报纸,《字林西报》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赞扬中国抗战“为人类文明增添了光芒”,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予以赞美,对日军的法西斯暴行予以谴责,体现了当时国际友人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而中国方面在上海也积极开展情报工作,为盟国提供各种重要信息。仅以中国和苏联特别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上海组为例,1938年底就已至少截获日方二十份重要军政文件。中共情报人员还为苏联提供了有关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确切情报。

这样的历史故事还有许多,例如中国远征军、美国飞虎队、苏联援华支援航空队、欧洲来华的国际纵队“西班牙医生”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初步形成的背景下,1941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主持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举行。会上,不仅朝鲜、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等东方民族

参加,而且犹太民族也作为东方被压迫民族之一应邀派代表与会,甚至还邀请了日本的反战人士出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按理说这些历史上的共同经历足以给世人以启迪和昭示。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集体的共同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而是与现实的导向密不可分。德国文化记忆创始人扬·阿斯曼就指出:“集体记忆的作用范围包含两个方向:向后和向前。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记忆是需要现实引导的,强化的,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但有时却常常遭到人为的遮蔽,使得历史很容易忘记。例如有些国家,对二战时期侵略和屠杀的历史不肯承认,不予以深刻反思,反过来却一味将自己塑造成战争的受害者和和平的倡导者。

由此,我们深切感到,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一方面要防止有意歪曲和篡改历史记忆的反记忆

现象,让某些历史记忆成为世界人民共同汲取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则应通过建立一些记忆载体,让世界人民之间友好互助的集体记忆得以传承和发扬。上述关于抗战期间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帮助的故事所蕴含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理念就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例如,现在几乎每位以色列和韩国领导人到访上海,都会前往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参观。每年都会在上海举办有关上海救助二战时期欧洲犹太难民的国际性活动。今后,我们不仅要通过建立博物馆、纪念碑,设立纪念日等方式为公众提供铭记历史的场所。而且还应该通过共同撰写历史教科书、联合举办历史专题展览、联合拍摄影视作品、联合开展主题美术创作、建立共同的公共网站、开展中国抗战故事外译工程等将中国人民的抗战记忆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二战记忆,使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合为一体。通过向世界讲好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故事,让这些历史故事和记忆植根于世界人民的集体记忆之中,并最终转化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